

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代表性的九位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张君勱、张东荪、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等进行了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就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改思潮的重大问题——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的关系，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各位人物，分章介绍，前列小传，后述思想，并且收纳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资料。全书文笔优美，简洁流畅。

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

——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

〔美〕纪文勋

五四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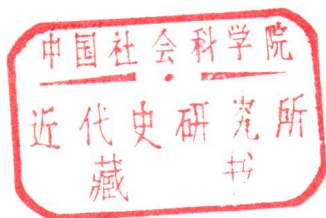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

丛书



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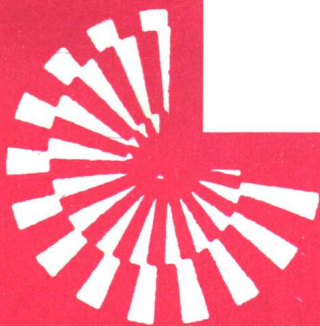
——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



著者 / 〔美〕纪文勋

译者 / 程 农 许剑波

校者 / 吴景平



山西人民出版社

**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
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

〔美〕纪文勋 著

程农 许剑波 译

吴景平 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25 字数：250 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203—00847—9

K·34 定价：4.70 元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

总 序——

发生于七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凝聚着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牵动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神经。七十年岁月流逝，五四早已时过境迁，但五四所揭示的历史主题——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心求索的时代主题。时下现代化变革所引发的文化反思，骤然缩短了五四与现代中国的时距，而使五四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渐凸现出来。在历史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传统仍是历史向前迈进的沉重包袱，民主和科学仍是我们时代的启蒙主题。这一切无不悲剧情味地告诉我们，无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我们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从现代化意义上讲，我们仍与七十年前的五四同处一个时代。五四孕育了文化巨变的时代，但由于其历史文化环境的严峻和变革主体思想的局限，

100-102 117213

1

终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文化嬗变。五四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文化再生的无限生机；而五四的变革极限，又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步履维艰。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文化变革还须从重新认识五四开始。这种重新认识，既是对五四启蒙事业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时代局限的超越。只有在继承和超越五四的基础上，中国文化才能实现重建和复兴。因而，在伟大的启蒙时代逝去大半个世纪而中国步入变革与复兴历史关头的今天，反省和重估五四的文化价值，就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而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理论课题。

有感于斯，值此“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编就了这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丛书的宗旨不在于简单地凭吊历史，而如其名所示，在于以现代中国的宏阔历史视野重新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省察五四的历史文化意蕴，而寻觅中国文化转形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途径。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对繁荣五四和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问题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而且能对广大关心民族运动和文化前途的读者有所裨益。

《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1989年1月于北京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纪文勋系美籍华人。自从五十年代移居美国后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作为他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于1986年在美、英两国同时出版。这时作者已经去世两年了。

关于本书的宗旨，作者在“引言”中说：“本书旨在叙述和评论有关中国社会改造种种构想……。书中考察了九位现代中国思想家的社会规划，他们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张君勱、张东荪、梁漱溟、陈独秀、毛泽东。这九位人物的思想展示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主要趋势。”长期以来，现代中国社会改造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么不敢涉及，要么就是简单化了。象本书这样专门以此为题的著作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学者，纪文勋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就与我们有别。他无疑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写作本书的。事实上，他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与权威主义相提并论，这是我们所不能首肯的。他所讲的典型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我们今天认为极左的东西（当然也不全如此），且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关系至大。这是我们阅读本书时所不能不注意的。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纪文勋的爱国思想也是十分强烈的。如他所说：“中国的命运牵动着我的喜怒哀乐。”这也正是促使他写作本书的直接动机。本书也能够超越党派之见说话，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持肯定态度。毫无疑问，对于正在进行各项改革的中国人民来说，本书提出的一些问题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原书全部译稿30万字。限于丛书篇幅，删减至20余万字。删减的部分包括：（1）一些非学术性而政治上对国内一般读者不适宜的词句和段落；（2）为国内读者熟悉而与原著主题相关不大的内容；（3）一些重复性的冗词赘语。进行上述处理后，全书的体系并未变改。与原著相比，内容则更为紧凑了。

本书的引言、第1、2、5、6、10章由程农翻译，第3、4、7、8、9章由许剑波翻译。全书由吴景平统校。

引 言——

中国近百年来所经历的变化，其剧烈程度超过了先前整个的历史沧桑，而近三十多年的变化又最为强烈、集中。1800年以前，中国尚是一个人口众多、政治稳定、经济自足的大国，令许多欧洲学人羡慕不已。中国自负地认为自己的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最优越；自以为地处世界的中心，四周都是蛮夷。尽管中国人对地球范围的了解不完备，他们可能觉得正在向一个和平的世界王国演化。中国人致力于内政和文化活动上，对军事重视不够。在1800年以前他们没有遭受严重的外部威胁，因而就看不出有必要建立对付外部侵略的适当防御力量。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的相对安宁开始丧失。这一危机发端于英国在通商幌子下对中国的鸦片倾销。

随后，别的列强也接踵而至，在中国的土地上挑起了一场场对华战争。军事上缺乏准备的中国无法对付列强的坚船利炮，结果不能保卫自己，抵御外侮，从此，中国开始蒙受重重耻辱。

鸦片战争及随后的其它战争导致了多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即通常所说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侵犯了中国的基本权利，使中国无法保持独立。孙中山曾经称当时中国的地位是次等殖民地，因为中国不象受日本奴役的朝鲜和屈从于法国的印度支那那样只遭受某一个强国的凌辱，而是在东西方大多数列强的共同压迫下呻吟。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威望扫地，许多政治经济主权丧失。中国人把条约规定的种种不平等视为国耻。

异族入侵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痛彻入骨的撞击，美国读者可以借助于下面引自R.R.帕尔默著作中的一段话感受到这一点：

在美国，如果外国军舰可以在密西西比河上随意航行，远至圣路易；如果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国土上随意来去而不受美国法律的约束；如果纽约、新奥尔良等许多城市出现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而又正是在这些租界里集中了所有的金融和实业；如果由外国人决定关税政策，负责征收关税并把这笔收入的大部分汇往他们本国政府；如果华盛顿西部象圆明园一样被烧毁，长岛和加利福尼亚象香港和印度支那一样被远道而来的强国吞并，而整个新

英格兰如满洲那样处于两个强邻的覬覦之下；如果政府当局与这些列强沆瀣一气，又沦为列强的宰割对象；如果全国大片地区充斥着盗匪、游击队和革命的秘密会党，他们在密谋反对陷于孤立的政府并不时地杀害外国人——只要读者想象一下这种状态下的美国会成个什么样子，他就能理解上一世纪末的中国人是怎样的敏感小心，就能清楚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会憎恶“帝国主义”这个词。^①

显然，外国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的威望与实力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单单将中国自身的历史问题归因于外国压迫却缺乏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问题是中国内部矛盾的后果，这种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要想客观而冷静地考察中国问题，就必须既看到列强侵略的冲击，也不忽视中国内部的积弊。

中国人过去一直自认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但是，在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之后，中国人一夜之间成了野蛮人，蒙受种种歧视。过去曾对中国表露敬意的西方思想家们现在也换上了一副鄙视人的嘴脸。于是，中国人开始丧失对自己国家的信心，民族自豪感也化为烟云。中国的公众舆论转而赞赏曾被视为蛮夷的列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原始。中国人还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向来就不是世界的地理中心。似乎是眨眼之间，中国就已经沦为殖民大国的猎物，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中国人把这种肢解形容为“瓜分”——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处在危机之中，国家毁灭、种族灭绝的危

险令中国人恐惧、惊悚。

这种局限的确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它既可被视为灾祸，却又能被看成是幸运。因为，按照汤因比的理论，正是厄运才能产生成就。他认为，创造文明的是逆境而不是顺境，极度困难局势的挑战会激发人们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去创造文明；②一种突然的毁灭性失败容易刺激失败者作出自我调整，去准备进行成功的应答。③

汤因比挑战和应战思想类似于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④对许多中国思想家来说，维护国家独立和保持文化延续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业，他们甘愿为这一事业而献身。这些思想家对历史挑战的应战，即他们复兴中国的构想，就成为我的研究主题。虽然思想家们指出的道路各有特色，但他们基本的宏伟目标却并无二致，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和保持中国文化延续。

本书旨在叙述和评论有关中国社会改造的种种构想，这些构想有的只是被提出，有的却已由热心于拯救中国民族和文化的人们实际施行过。书中考察了九位现代中国思想家的社会规划，他们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张君勱、张东荪、梁漱溟、陈独秀和毛泽东。这九位人物的思想展示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主要趋势。

思想史写作有两种方式——一般方式和概念方式。前者侧重从历史年代的发展来分析思想家的观点，后者却强调概念的重要性。为了清楚说明每位思想家有代表性的重要观点，我主要采用了概念方式。然而，这本著作并不是严格的

思想史，它只是集中研究思想史的一个方面，即重要思想家所设想的社会改造方案。尽管这只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部分，上述两种探讨方式却都可以有选择地用于研究。遇到某位思想家有重大思想变化的情况，我也会运用一般方式来指出其观念的前后转变过程。例如陈独秀年青时曾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以后又回归民主主义。对这一演化经过我就作了剖析。这九位思想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思想脉络，其要旨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提出实行全面和根本变革的思想家。构成其大同理想的种种设想要比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激进得多。他不仅主张取消个人财产和国家政府，而且提出彻底解散家庭，甚至还要废除个人姓名而代之以数字编号。但是，康有为又告诫说这种理想只能在遥远的将来实现，眼前则应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他虽然独创性不如乃师，影响却更为广泛深远。他在政治上先是拥护君主立宪，到1911年民国建立后又转而支持共和。梁勤于笔耕，著述宏富，全部著作合计至少有1600万字。因为文风有磁石般的魅力，也因为宣传的是西方思想与变革主张，梁启超对中国人的思想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孙中山与倡导和平改良的康梁不同，他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他在1911年前的早年活动以暴力排满为宗旨，基本是民族主义运动性质。支配其行动的主要是视满人为异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到1924年时，孙中山已把

三民主义发展为系统的学说，形成了完备的革命理论。

虽然共和政体的建立意味着表面形式的巨变并造成思想学说的激烈转变，中国的困境却依然如故，现代化问题仍是悬而未决。民国建立以后，有三种各有特色的思想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意识形态中引人注目的成分。它们的代表是四位学者文人。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角之一。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就意味着创造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他所向往的新文化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取代。因而他断然认为全盘西化才是拯救中国的根本出路，这种西化又应特别注重西方文明的两个突出特征——科学与民主。

张君勱（在西方一般被称为“张嘉森”）是在中国提倡议会民主的思想代表。他一生梦寐以求的便是制订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这种议会要以英国为蓝本并根据中国国情适当调整。张东荪是张君勱的挚友和同僚，他的见解和张君勱相同。胡适和二张都激烈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专政，不管这种专政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是共产党的民主专政。

梁漱溟的社会改造方案是以其对世界文化三种样式的分析比较为基础的。通过研究，他断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他坚信真正的儒学复兴不但可以拯救中国，甚至还可以使世界免于堕落与毁灭。颇有意思的是，梁漱溟虽然将儒学推崇为哲学理想，他提出的实际改革办法却是所谓乡村建设，其具体方式便是知识分子到农村深入农民之中。这种构想与共产

党的做法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它们的理论基础却有天渊之别。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位核心人物，其政治思想有着复杂的变化过程。五四运动以前，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渴望使中国全面仿效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1920年他转而信奉共产主义，此后一段时期里，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然而，约二十年和共产国际、苏联以及斯大林打交道的痛苦经验摧毁了他心中的苏俄式共产主义的偶像。他晚年虽然仍信仰社会主义，但已回归到原先的信念，即认为民主具有超越时间界限、超越阶级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内在价值。

本书述及的最后一位人物毛泽东，在这些思想家中影响最为深远。他和除孙中山以外的上述诸人不同，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设想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他革命生涯的前段是组建农民武装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政权。胜利之后，他又领导人民进行不间断的革命，这场革命依若干阶段而向前发展，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毛泽东改造中国的方式和其他所有代表人物都迥然不同。

上述九位思想家的社会改造构想各不相同，而毛泽东和其他思想家之间又有着重要的区别。毛泽东主张共产主义理论，因而提倡暴力革命，其余人则都持比较缓和渐进的态度。甚至孙中山也是一位渐进主义者，在满清垮台后，他就意图采取和平渐进方式改造社会。还有，毛泽东主张集中控

制管理的计划经济，而其余思想家却都拥护自由经济，只是或多或少地赞成增补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而已。

共产党压倒现代中国其它一切政党并夺取了政权的同时，也战胜了其它所有派别的思想。自二十世纪初共产主义传入中国起，它就日益成为传播广泛的强大思想潮流。虽然非共产主义思想家各有其救亡主张，不同意共产主义理论，他们却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理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需要认真对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置之不理是不可能的。

典型的共产主义思想史专家认为，一切思想斗争（包括民族性质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发展而相应演化；而且，所有近代中国的思想斗争都围绕着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这一中心展开。他们觉得，因为近代中国革命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大革命，从而近代中国思想史就是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思想在群众中萌芽和发展的历史。同时它又是一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起源、发展、衰朽、最终没落的历史，也是一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成长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史可以划为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而思想史也应相应分成这两个阶段。^⑤按照另一种略微不同的体系，近代思想的演进历程被理解为革命思想代替改良思想，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又战胜其它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历史，最终则是无产阶级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⑥共产主义史学家所说的资产阶

级路线或改良路线实际上就是指发端于康有为时期的民主运动。

下面我将尽可能准确、客观而深入地描绘出九位思想家有关社会改造的方案，以便展示出每位人物的真实思想。在每章开头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人物的生平，我相信，他们的活动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对中国人的影响究竟达到了何种深度和广度。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又出生于本世纪初，是在剧烈的社会动乱气氛中长大成人的，因而中国的命运牵动着我的喜怒哀乐。本书研究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正是探索中国之命运的结果。所以，我对这些人物思想的理解比起异国人或青年人来更为深刻和准确。总之，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我对这些思想的领悟符合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同样，我对中国所抱的希望也与他们息息相通。

在“结论”一章里，我首先要阐明只有共产党成功掌权的原因。其次，由于有关共产主义思想家与非共产主义思想家的思想斗争的叙述分散在前面各章里，这里便试图集中对重要的意识冲突作专题的剖析。第三，应当依照一个政党的行为来判断它的思想。共产党执政已有三十多年，现在运用这一标准来评价共产主义思想的结果，该是适逢其时了。这种评价既要考虑到共产主义立场，又要顾及非共产主义观点；它将考察实现了的愿望，也要探索失落掉的梦想，还要说明为共产党自己在实践中修改甚至抛弃的某些观点。最后，我还将大胆地预测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历史的走向。

注 释

- ① R. R. 帕尔默《世界近代史》第五版（纽约，诺普夫，1978），第637—638页。
- ② 阿诺德·J·汤因比《历史研究》之D·C·萨默维尔的节本（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第358页。
- ③ 同上，第360页。
- ④ 《孟子》
- ⑤ 石峻、任继愈、朱伯崑《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9—10页。
- ⑥ 同上，第17页。